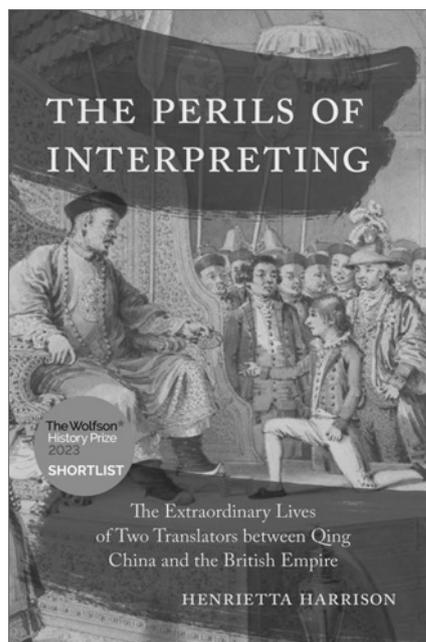


# 再釋馬戛爾尼訪華

——評 Henrietta Harrison, *The Perils of Interpreting: The Extraordinary Lives of Two Translators between Qing China and the British Empire*

● 江家欣

1793年，馬戛爾尼使團訪華是開啟中英外交關係的重要歷史事件。除了外交官員之外，還有哪些關鍵人物在使團訪華過程中協助兩國的交流？使團謁見乾隆皇帝的過程真的被全部挖掘出來了嗎？諸如此類問題仍有較多的討論空間。



Henrietta Harrison, *The Perils of Interpreting: The Extraordinary Lives of Two Translators between Qing China and the British Empir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21).

走進英國倫敦肯辛頓的維多利亞和阿爾伯特博物館 (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 V & A)，我們能在「歐洲與亞洲之邂逅」(Encounters: The Meeting of Asia and Europe 1500-1800) 的常設展覽中追尋到中英兩國交往的歷史蹤迹。1793年，馬戛爾尼 (George Macartney) 使團訪華是開啟兩國外交關係的重要歷史事件。博物館中有不少展覽品承載着這段歷史記憶，其中兩件便是清朝乾隆皇帝賞賜給斯當東父子 (George L. Staunton and George T. Staunton，下文稱大斯當東和小斯當東) 的玉如意。

關於馬戛爾尼使團來華的目的和大體過程，已被諸多中外史家記載和討論。親歷者大斯當東筆下的《英使謁見乾隆紀實》(An Authentic Account of an Embassy from the King of Great Britain to the Emperor of China) 在海內外廣為流傳。馬戛爾

尼伯爵日記中對此次出使的記載也被編撰成書<sup>①</sup>。以往中外學界傾向將這一重大歷史事件置於中英外交關係之歷史脈絡中討論，強調兩個新老帝國在文化理念、經濟利益、國際秩序等層面的衝突。學者認為該事件透露出中國對外部世界的漠視和無知，最終引發鴉片戰爭<sup>②</sup>。美國學者何偉亞 (James L. Hevia) 在《懷柔遠人：馬戛爾尼使華的中英禮儀衝突》 (*Cherishing Men from Afar: Qing Guest Ritual and the Macartney Embassy of 1793*) 中運用後現代主義的視角與方法重新審視這一歷史事件，對上述觀點發起挑戰。他不僅考察了馬戛爾尼使團訪華之始末，還對使團之相關記載和表述進行爬梳，最後歸結出使團訪華事件本身、各方對事件的不同定義實質上是不同觀念體系碰撞的結果，同時也是西方各國建構和推廣以國際法為基礎的世界秩序體系的產物<sup>③</sup>。何偉亞的著作一經出版，便引起學界對馬戛爾尼使團訪華之目的和後現代主義的研究方法的熱烈討論<sup>④</sup>。

不過，此番熱潮過後，學界對馬戛爾尼使團的討論逐步走向沉寂。在大國外交博弈的視野之外，V & A 博物館的玉如意背後到底有着甚麼樣的故事？斯當東父子是誰？他們在使團中扮演甚麼角色？除了外交官員之外，還有哪些關鍵人物在使團訪華過程中協助兩國的交流？使團謁見乾隆皇帝的過程真的被全部挖掘出來了嗎？諸如此類的問題，仍有較多的討論空間。

牛津大學亞洲與中東研究系教授沈艾娣 (Henrietta Harrison) 的新

著《口譯的危險：清代中國與大英帝國兩位譯員的非凡人生》 (*The Perils of Interpreting: The Extraordinary Lives of Two Translators between Qing China and the British Empire*，以下簡稱《口譯的危險》，引用只註頁碼) 詳細地回答了上述問題。她利用大英圖書館藏的斯當東文書、英國國家檔案館藏的東印度公司檔案、那不勒斯中華書院 (Collegio dei Cinesi) 所藏的傳教士信件等多種中外文資料，復原了為馬戛爾尼使團承擔翻譯工作的李自標和後來成為東印度公司廣州商館譯員的小斯當東兩人相互交錯的人生軌迹，揭示他們在中西經濟文化交流歷史中所發揮的重要作用。該書從兩位譯員的視角出發，娓娓道來十八世紀末至十九世紀初全球化進程中的中西交往的精彩故事。

除了緒論和結語之外，全書由四個部分組成，共二十章。第一部分「跨越世界的人生」包括第一至四章，分別對李自標和小斯當東的家庭背景和童年經歷進行介紹。第二部分「李自標與馬戛爾尼使團」由第五至十一章組成，講述馬戛爾尼使團建立的來龍去脈和李自標加入使團的經過，以及他在使團訪華前後的各項活動。第三部分「小斯當東與廣州貿易」包括了第十二至十六章，主要討論小斯當東在後馬戛爾尼使團時代的活動。第十七至二十章構成本書的第四部分「驅逐」，敘述了李自標和小斯當東晚年的故事及背後所呈現的中西關係的急劇變化，並且對歷史人物如何淡出歷史舞台和人類記憶進行了一番思考。

《口譯的危險》復原了為馬戛爾尼使團承擔翻譯工作的李自標和小斯當東相互交錯的人生軌迹，揭示他們在中西經濟文化交流歷史中所發揮的重要作用，娓娓道來十八世紀末至十九世紀初全球化進程中的中西交往。

《口譯的危險》是沈艾娣運用全球微觀史的方法進行研究的力作，該書兩位主角李自標和小斯當東都是全球史中典型的「小人物」，他們憑藉在跨文化背景下習得的語言技能，介入甚至主導中西經濟文化交流的歷史進程。

《口譯的危險》是沈艾娣運用全球微觀史的方法進行研究的又一力作，該書運用了新材料、新視角和新方法，詮釋馬戛爾尼和阿美士德 (William Amherst) 的訪華旅程、東印度公司在廣州貿易的實際狀況，以及英國發動第一次鴉片戰爭的經過，極大地豐富了我們對鴉片戰爭以前中英關係史的理解。本文主要從史實、史觀、史法三個層次，談一談筆者的閱讀心得。不過，正如沈艾娣和著名翻譯史研究者王宏志所強調的，翻譯絕對不是一個簡單的過程，當中一定會夾雜着譯者對異域語言和文化的個人理解<sup>⑤</sup>。下文的管窺之見，多有未盡之處，還望作者及諸位讀者批評指正。

## 一 全球史中的「小人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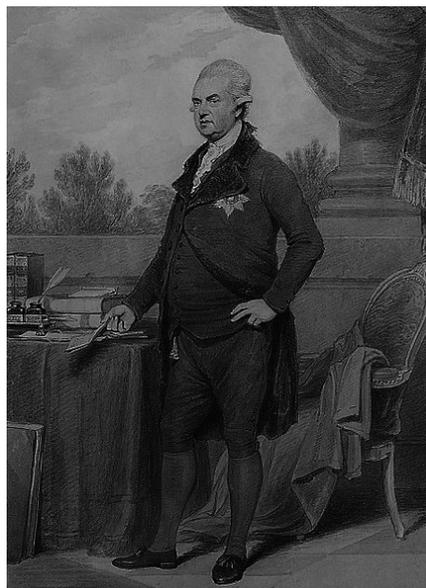
《口譯的危險》中的兩位主角李自標和小斯當東都是全球史中典型的「小人物」，他們的人生可說是國際跨文化交流或者說全球化背景下的產物<sup>⑥</sup>，二人同時又憑藉在跨文化背景下習得的語言技能，介入甚至主導中西經濟文化交流的歷史進程。

李自標出生於中國涼州 (今甘肅省武威市) 一個天主教家庭，十三歲時被送往意大利南部的那不勒斯中華書院，在那裏接受神學、拉丁文和中國傳統文化的教育，書院的負責人法蒂加蒂 (Gennaro Fatigati) 評價他是班上最年輕卻最優秀的學生。在羅馬參與神學考試時，他不僅取得優異成績，還得到面見教皇

的機會。李自標在1784年二十四歲時正式成為一名神父。按理來說，他應該返回中國開啟其傳教事業，但卻因書院的經費不足而滯留歐洲，輾轉前往羅馬任職。這為其邂逅馬戛爾尼使團和斯當東父子埋下伏筆。

大斯當東出生於一個具有天主教背景的愛爾蘭家庭，先後前往西印度群島和印度，為英國的殖民擴張事業服務，並在此期間與馬戛爾尼建立起革命友誼。大斯當東思想開放，對新的科學和技術充滿熱情。遊歷歐洲以後，他意識到拉丁語的重要性，因此十分注重小斯當東的拉丁語教育。小斯當東受到其父親的影響，自小學習拉丁文。

隨着1775年美國獨立戰爭的爆發，英國將其殖民擴張的重心轉向東方，有意改善與中國的貿易和外交關係。馬戛爾尼使團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中組建。馬戛爾尼在挑選使團譯員時，有意避開東印度公司的譯員和常駐北京的傳教士群體，傾



馬戛爾尼傾向在歐洲挑選使團譯員。(資料圖片)

向在歐洲挑選。他認為這既可以避免地方性的影響，又有利於在旅途中培養譯員的忠誠度和可信賴度。在這樣的理念下，大斯當東先後被馬戛爾尼派往法國和意大利物色人選。在英國駐意大利使館的協助下，大斯當東成功邀請到李自標和另一位神父隨行，並聲明這兩位譯員的任務是指導英國使團了解中國的風俗和語言。斯當東父子作為使團成員，在這趟旅程中結識李自標等人；年僅十三歲的小斯當東在訪華途中開始跟隨李自標學習中文。

綜合來看，不論是李自標與小斯當東的活動空間軌迹、個人成長經歷、彼此的相遇，抑或是他們在馬戛爾尼使團結束後所從事的活動，都反映了全球各地之間的聯繫日益緊密。《口譯的危險》巧妙地將這種全球性聯繫 (global inter-connection) 及相關的全球性制度體系 (global institution) 通過李自標和小斯當東的故事呈現。

李自標的成長經歷告訴我們，除了我們所熟知的與康熙皇帝關係甚密的湯若望 (Adam Schall)、活躍於東南沿海的耶穌會會士外，天主教傳教士的足跡早已跨越沿海地區。他們深入中國西北內陸並建立據點，這些據點逐步成為全球天主教網絡的重要節點，後者構成人口流動、信息傳遞、技術傳播和中西思想文化交流的基礎。天主教傳教士通過這一網絡了解中國內地的具體情況並進行傳教活動。他們根據中國的社會環境、民眾的信仰習慣等，制訂出培育中國神父、派遣學生前往歐洲修行的傳教政策。



自第一次中國之旅結束後，小斯當東始終堅持學習中文。(資料圖片)

李自標的父母透過該網絡了解到那不勒斯中華書院的資訊，並將他們的兒子送往歐洲；也正是這一網絡，使李自標在馬戛爾尼使團訪華後留華傳教，並依然與書院和羅馬主教保持書信聯繫，互通消息 (頁 143-51)。此外，書院中特別定制的中文和拉丁文課程，以及來自不同國家和地區的教師和學生的人員構成，都能很好地呈現出李自標生活在一個多元文化交匯的、全球性的環境之中。

小斯當東在其父親引領下親身參與了全球貿易的發展。自第一次中國之旅結束後，他在大斯當東的安排和引導下，始終堅持學習中文，並於 1799 年返回中國，在東印度公司廣州商館擔任文職 (頁 159)。他本人與在廣州經營中外貿易的商人群體關係十分密切。《口譯的危險》第三部分便聚焦於小斯當東再次來華後的活動，尤其是在各歷史事件中充當譯員的角色：他先後協助西人向中國譯介牛痘種植技術、

沈艾娣始終保持着對宏大歷史背景的關懷，進而揭露事件背後的全球性聯繫。從李自標的人生可以觀察到清廷對於天主教的態度惡化；而小斯當東的人生則透露了英國國家力量的強化，以及中英貿易與外交關係的改變。

沈艾娣將主標題定為「口譯的危險」，有以下兩個方面的考量：一方面是譯者的權力對跨文化交流帶來的危險，另一方面則是在跨文化交流裏擔任譯員是一項十分危險的工作。

調停英國「海王星」(Neptune) 號水手和中國民眾的衝突、翻譯《大清律例》並向西方介紹中國的法律制度、投資中國行商、介入通事「阿耀案」、參加阿美士德使團，等等。這些大大小小的歷史事件都是商品、知識、制度、理念等物質和文化在全球流動的結果。

沈艾娣的著作看似聚焦小人物的故事，實質上始終保持着對宏大歷史背景的關懷，進而揭露這些事件背後的全球性聯繫。從李自標的人生來看，我們可以觀察到清廷對於天主教的態度和政策的惡化；而小斯當東的人生則直觀地透露了英國國家力量的強化，以及由此引起的中英貿易與外交關係在兩個世紀之間的改變。筆者以為，這才是全球史研究的正確「打開」方式——全球史研究是一種不同於外交史、國際關係史的分析方法，強調跨越時間、空間和特定範疇來看待歷史問題<sup>⑦</sup>。

此外，沈艾娣特別強調環境對歷史人物的影響。她認為李自標和小斯當東之所以在翻譯能力上如此突出，是因為他們出生於多元文化交匯的環境中。比如，李自標的出生地涼州，地處要衝，漢、藏、蒙、滿等文化在此處交匯，翻譯活動在此處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頁23)。但是，在這裏出生且有相似經歷的人都能成為李自標嗎？答案是否定的。李自標在歐洲學習和工作的人生經歷是獨一無二、不可複製的，他的故事雖然呈現了全球各地的互動，但有其特殊性，且只能反映全球歷史的其中一個側面。

## 二 譯者的權力與危險

《口譯的危險》英文版於2021年面世，目前還沒有中譯本。該書題名或可譯作《口譯的危險：清代中國與大英帝國兩位譯員的非凡人生》，又或譯作《危言大譯：英國與大清帝國兩位通譯的不凡人生》。這兩種譯法都保留了兩個關鍵要素——「翻譯」和「危險」。筆者以為，沈艾娣將主標題定為「口譯的危險」，有以下兩個方面的考量：一方面是譯者的權力對跨文化交流帶來的危險，另一方面則是在跨文化交流裏擔任譯員是一項十分危險的工作。

翻譯是一個文化交流與碰撞的過程，是譯者在跨文化語境中對不同文化的熟悉程度的體現，是其在遣詞造句和表達方式層面作出選擇的結果，也是該群體主導外交談判過程，甚至是左右歷史發展之權力所在(頁8-9)。正如王宏志的研究表明，翻譯活動，尤其是外交場合中的翻譯，對中外關係的走向起着極其重要的作用<sup>⑧</sup>。

在《口譯的危險》中，李自標在為馬戛爾尼使團轉達其來華訴求時，典型地呈現出譯者的權力所在。對比中外材料可以發現，使團提出的訴求只有六點，主要與中英貿易有關，分別是：在舟山附近割讓一個島嶼給英商、允許英國使臣駐華、允許在舟山或天津貿易、在京城建立倉庫、減少貨物往來廣州和澳門的轉運稅，以及擬定稅則。但是李自標將這些訴求從拉丁文翻譯成中文時，卻增加了一條善待中國天主教徒的條款。顯然，這是李

自標在向和珅、松筠等清政府官員轉述的過程中，基於其傳教士的身份和為天主教在華傳播事業打開方便之門而冒險加上的。所幸的是，這一做法在李自標巧妙的說辭之下未被識破（頁126-28）。由此可見，譯者在中英外交中擁有的權力不容小覷。若是這些訴求被乾隆皇帝應允，那麼中西關係的歷史將會被徹底改寫。

此外，譯者還掌握着選擇甚麼樣的表達方式的權力。例如，小斯當東與倫敦傳道會傳教士馬禮遜（Robert Morrison）的翻譯方式便有很大的差異。在1807年英國水手與中國民眾發生激烈衝突的「海王星」號案中，小斯當東憑藉他對中英兩國文化差異的認識，以英國人可以理解和在英國文化語境中熟悉的語言翻譯中文文件，並藉由對中國法律知識的了解在庭審內外與中方交涉，最終使涉案水手得以罰款輕判（頁176-78）。也就是說，小斯當東採取的翻譯策略是意譯。與之相反，馬禮遜則熱衷於一字一句地直譯，例如在另一宗中英刑事交涉事件中，他將「中華」譯為“middle charming empire”（位於中央的、具吸引力的帝國），翻譯出來的文稿佶屈聱牙，談判過程十分艱難（頁185-86）。事實上，馬禮遜的翻譯直觀地反映了中英的文化差異，而小斯當東在翻譯中加入自己的理解，並透過這種方式減輕了政治、文化衝突。這說明了翻譯在某些情況下能夠起到協調的作用，在某些情況下則激化了矛盾。由此可見，譯者有操控局勢的能力和權力。

擔任譯員又是十分危險的工作。當李自標意識到清朝統治者可能識破自己的心思後，感歎「即使是最愚蠢的人在知曉〔為馬戛爾尼使團充當譯員的〕危險性後也不會像我這麼做」（頁129）。中國譯員吳亞成和李耀用實際經歷證明了這一點（頁195-206）。其中，李耀的案件成為了十九世紀初中英進行利益博弈的焦點。李耀即英人口中的「阿耀」，是一名翻譯人員，時人將這類群體稱之為「通事」。他自1804年起為英商提供貿易中的翻譯服務，與東印度公司廣州商館的小斯當東等人的關係日漸密切，並且憑藉在中外貿易中特殊且重要的媒介身份，收取服務費，逐漸積累了巨額財富。隨後，他利用這些財富為自己加官進爵。也正是這一點，他在1814年被清政府定性為犯下「身服賤役」卻報捐職銜、勾結夷人、誣騙錢財等罪，被發配邊疆充軍。

對於此案，王宏志和吳義雄從不同的角度進行了詳細的分析。王宏志側重討論通事群體在廣州貿易體制中發揮的實質作用，指出李耀因為通事工作而成為中英乃至中、英、美三國政治鬥爭的犧牲品。吳義雄進一步解釋，除了與國際政治形勢相關，阿耀案也被中英雙方視為解決當時愈加頻繁的貿易衝突之突破點，是清政府試圖奪回英人獲得的商業權力的方案之一<sup>⑩</sup>。沈艾娣則在小斯當東的故事脈絡中展開對阿耀案的討論，一方面呈現了小斯當東在案件中所擔任的譯員角色，另一方面揭示了阿耀案使小斯

馬禮遜的翻譯直觀地反映了中英的文化差異，而小斯當東在翻譯中加入自己的理解，並透過這種方式減輕了政治、文化衝突。這說明了翻譯在某些情況下能夠起到協調的作用，在某些情況下則激化了矛盾。

當東進一步意識到在中英關係急速惡化下充當譯員的危險性，直接影響了他拒絕在1816年訪華的阿美士德使團中擔任譯員，隨團赴京時甚至聲稱已經忘記在馬戛爾尼使團時的經歷(頁212-17)。

### 三 在日記和書信中發現歷史

沈艾娣十分擅長運用日記或書信開展歷史研究，並且為推動近代中國的社會文化史、華北鄉村地區的宗教研究和全球史的發展做出了卓越的貢獻。據她本人介紹，《口譯的危險》、《夢醒子：一位華北鄉居者的人生(1857-1942)》(*The Man Awakened from Dreams: One Man's Life in a North China Village, 1857-1942*)和《傳教士的詛咒：一個華北村莊的全球史(1640-2000)》(*The Missionary's Curse and Other Tales from a Chinese Catholic Village*)是她「探討山西歷史及其與外部世界關係的三部曲」<sup>⑩</sup>。筆者認為，這三部著作均以某位或某些小人物為故事的中心，以日記或書信為關鍵史料，結合檔案、報紙、文集等多種史料，關注這些主角及其所在地區與外部世界的全球性聯繫。

《夢醒子》利用劉大鵬的日記和作品，以及其他相關材料，細緻地描繪了清代舉人、貧寒的私塾先生劉大鵬的一生，藉此復原二十世紀前期中國鄉村日常生活的鮮活面貌，同時呈現出在歷史演進的巨輪下，中國傳統社會文化和社會層級

的具體變化。此書通過劉大鵬的具體案例，不僅顛覆了過去我們對中國士人高貴形象和地位的理解，還豐富了我們對於獨立個體如何應對中國政治、經濟、文化制度的變革過程的認識<sup>⑪</sup>。

在《傳教士的詛咒》中，沈艾娣運用山西洞兒溝村的傳教士與羅馬教廷的往來書信，以及對洞兒溝村民的口述採訪資料，講述該村數百年來的崇拜習慣和國際天主教網絡的關聯並不能簡單地用基督教中國化/本土化來解釋，這種關聯是「教眾、中籍教士、方濟各傳教士，以及教會高層相互妥協的結果」<sup>⑫</sup>。也就是說，中西傳教士、教眾的關係不能被簡單地、理所當然地看作強勢傳播者和被迫接受者的關係。各方勢力之間的互動，共同推進着歷史的發展。這種認識事實上適用於理解中西交往的各個層面<sup>⑬</sup>。

無論是在來華使團中擔任翻譯的李自標和小斯當東的故事，抑或是洞兒溝村的歷史，都是中國歷史、中西關係史、全球史的重要組成部分，但是它們在以往學界以國家關係、政治制度等宏大命題為中心的敘述中被邊緣化。通過發現和爬梳有關的私人日記和書信記載，這些「邊緣化」的歷史故事逐步被挖掘，讓讀者對歷史的豐富層次和內容的認識得以逐步深入。沈艾娣在挖掘洞兒溝村的相關歷史檔案的過程中，發現了傳教士李自標與羅馬教廷的通訊，順藤摸蔓地追查到他曾為馬戛爾尼使團擔任譯員(頁8-9)。在此基礎上，她結合利

《口譯的危險》、《夢醒子》和《傳教士的詛咒》是沈艾娣探討山西歷史及其與外部世界關係的三部曲，均以小人物為故事的中心，以日記或書信為關鍵史料，結合檔案、報紙、文集等多種史料，關注這些主角及其所在地區與外部世界的全球性聯繫。

用小斯當東幼年時期的日記和他寫給母親的書信，以及李耀寫給小斯當東的書信，譜寫了一個關於在中英外交過程中發揮樞紐作用的譯員的故事，由此進一步揭示中西之間在翻譯層面更為深層次的聯繫。

日記和書信承載的歷史信息和線索有着十分鮮明的特色。首先，不同於政府和相關機構的官方檔案，日記和書信的記載更加貼近日常，當中的信息更能反映個體對於宏觀的政策制度的實際體驗；其次，不同於報刊雜誌，它們是富有情感和存在個體差異的，而且能清晰和準確地呈現撰寫日記者或書信人的人際關係網；再者，日記和書信的內容呈現的時間相對集中，且具有連續性。上述特點都為史學研究者進行微觀層面的歷史書寫帶來便利，使微觀歷史學成為可能。不過，運用日記和書信的難度與其價值往往成正比。日記和書信的記錄常常是零星和分散的，而且在過去的年代多是手寫稿。李自標用拉丁文寫給羅馬教廷的信，單是辨識字體就耗時耗力，更何況十八世紀的拉丁文與現代拉丁文多有不同，理解這些詞句也需要廣泛地涉獵各類背景知識，可以想見沈艾娣為完成《口譯的危險》這部著作，投放了極大的耐心和精力。

沈艾娣十分注重多方材料的比對和互證，對官方檔案、地方史志、報刊雜誌和口述採訪等不同類型的史料同樣重視。為了撰寫《口譯的危險》，她不僅對與李自標和小斯當東有直接關聯的羅馬天主教檔案和東印度公司檔案進行爬梳，

還大量運用了中國的檔案、文史資料，如《清季外交史料》、《四庫全書》、《林則徐全集》，等等。在討論馬戛爾尼是否向乾隆皇帝下跪的問題時，沈艾娣向我們呈現了李自標、小斯當東、大斯當東、馬戛爾尼、清廷、十九世紀初期的輿論等不同角度的描述，並試圖解釋這些描述存在差異甚至是相互矛盾的原因。例如，馬戛爾尼在呈送給英王喬治三世 (George III) 的日記中記載的是「單膝跪地並〔向乾隆皇帝〕致以祝賀」，他的表兄弟的日記描述的卻是「我們按照該國慣常的禮儀致以敬意——跪下並叩首九次」。小斯當東的日記中雖然寫的是「我們單膝跪地並叩首到地」，但有明顯的修改痕迹。沈艾娣認為，馬戛爾尼在出發之前已表達過必要時會跪拜，以及後來出版的使團記述中對這段過程隻字未提，都暗示了他們實際上作出雙膝跪拜的妥協。「單膝跪地」是刻意製造的「結果」(頁120-22)。沈艾娣在何偉亞的《懷柔遠人》的論述基礎之上，對「天朝上國心態」敘事被創造的過程亦進行了更加精細和深入的探討。例如，在鴉片戰爭前夕，英人為合理化其發動戰爭的行徑，選擇無視精通中國文化的小斯當東的解釋，硬將中文意思由「商貿監督」(foreign superintendent) 直接翻譯成「夷目」(barbarian eye, 頁245-46)。

通過日記和書信，以及與其他各類史料的對比和結合，沈艾娣致力於挖掘不同個體、不同地區和不同文化之間的關聯，並且利用這種不同的關聯，把握史學家手中呈現

沈艾娣致力於挖掘不同個體、不同地區和不同文化之間的關聯，將微觀歷史學的方法與全球史整合，講述在全球視野下的「跨越世界的人生」的故事，即「活在兩種文化之間的眾多他者的故事」。

透過全球微觀史的視角，沈艾娣跳脫出傳統外交史或國際關係史的敘述框架，釐清所謂的「天朝上國」、「懷柔遠人」心態的製造過程。至於中西貿易關係對馬戛爾尼和阿美士德的出使、鴉片戰爭的影響，或許值得投入更多的筆墨。

歷史地圖的比例尺，將微觀歷史學的方法與全球史整合，講述在全球視野下的「跨越世界的人生」的故事，即「活在兩種文化之間的眾多他者的故事」(頁14)。繼鄉村舉人、在華外國傳教士後，《口譯的危險》是展開全球微觀史研究的又一經典之作。

#### 四 餘論

在何偉亞對學界基於西方中心論或東方主義論述馬戛爾尼使團事件進行批判的基礎上，《口譯的危險》通過剖析親歷馬戛爾尼使團訪華的李自標和小斯當東的生平，盡可能地復原使團訪華的全球性時代背景，呈現出在我們所熟知的政府外交官員之外，翻譯群體在重大外交事件中的角色，為我們揭示中西交往歷史的另一面。與此同時，透過全球微觀史的視角，沈艾娣跳脫出傳統外交史或國際關係史的敘述框架，用生動的故事釐清所謂的「天朝上國」、「懷柔遠人」心態的製造過程。

無獨有偶，此前筆者讀到英國歷史學者麥吉(Nicholas McGee)一篇考證乾隆皇帝對海外華僑的態度文章。該文抽絲剝繭地考察海內外學界常常引用的「天朝之棄民，不惜背祖宗廬墓，出洋謀利，朝廷概不聞問」，並非出自乾隆皇帝或清政府官員之口，而是起源於大斯當東的《英使謁見乾隆紀實》。這一說法本身或許就是荷蘭殖民者為了合理化其屠殺巴達維亞華民的行徑

而製造的輿論。大斯當東道聽途說後，又根據自己的理解對荷蘭因為屠殺一事朝覲乾隆皇帝進行記述。此記述影響了此後三個世紀人們關於清朝統治者對海外移民態度的理解<sup>①</sup>。這再一次提醒研究者，應當注意考辨各類可能已被加工過的中文材料和那些理所當然地被接受的歷史事實。

《口譯的危險》的主旨是通過李自標和小斯當東兩位譯員的生平故事，揭示中國與世界的聯繫以及這種聯繫的歷史變化。李自標晚年四處隱匿傳教、小斯當東參與廣州貿易時遇到的困難，正是中西關係發生急劇轉變的結果，但是這種轉變為何發生、如何發生，本書並未給出更多的解釋。處於中西關係之核心的貿易關係，對馬戛爾尼和阿美士德的出使、鴉片戰爭的影響，或許值得投入更多的筆墨。當然，這些建議並無損該書在歷史史實和研究方法上的貢獻。

#### 註釋

<sup>①</sup> George Staunton, *An Authentic Account of an Embassy from the King of Great Britain to the Emperor of China*, vol. 1-2 (London: W. Bulmer and Co., 1797); George Macartney, *An Embassy to China: Being the Journal Kept by Lord Macartney during His Embassy to the Emperor Ch'ien-lung, 1793-1794*, ed. J. L. Cranmer-Byng (London: Longmans, Green, and Co., 1962).

<sup>②</sup> Hosea B. Morse,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 vol. 1 (London: Longmans,

Green, and Co., 1910), 53-55 ; 朱雍：《不願打開的中國大門：18世紀的外交與中國命運》（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9），頁194-244；羅志田：《後現代主義與中國研究：〈懷柔遠人〉的史學啟示》，《歷史研究》，1999年第1期，頁103-104等。

③ 參見何偉亞（James L. Hevia）著，鄧常春譯：《懷柔遠人：馬戛爾尼使華的中英禮儀衝突》（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

④ 有關討論參見周錫瑞（Joseph W. Esherick）著，尚揚譯：《後現代式研究：望文生義，方為妥善》；艾爾曼（Benjamin Elman）、胡志德（Theodore Hutters）著，趙剛、孟悅譯：《馬戛爾尼使團、後現代主義與近代中國史：評周錫瑞對何偉亞著作的批評》，《二十一世紀》（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1997年12月號，頁105-17、118-30；張隆溪：《甚麼是「懷柔遠人」？正名、考證與後現代式史學》，《二十一世紀》，1998年2月號，頁56-63；葛劍雄：《就事論事與不就事論事——我看〈懷柔遠人〉之爭》，《二十一世紀》，1998年4月號，頁135-39。

⑤ 例如，王宏志認為小斯當東「卑恭謙順」的翻譯風格，是在學習中文的過程中受到李自標的影響，但英方對過份謙卑的翻譯態度往往並不滿意。參見王宏志：《「張大其詞以自炫其奇巧」：翻譯與馬戛爾尼的禮物》，載《翻譯與近代中國》（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4），頁85-86。

⑥ 國際跨文化交流不等同於全球化，但是在《口譯的危險》的語境中，跨文化交流的過程是全球化的一個環節。

⑦ James Belich, John Darwin, and Chris Wickham, "Introduction: The Prospect of Global History", in *The Prospect of Global History*, ed. James Belich et al.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3.

⑧ 參見王宏志：《大紅毛國的來信：馬戛爾尼使團國書中譯的幾個問題》、《「張大其詞以自炫其奇巧」》，載《翻譯與近代中國》，頁3-54、55-90。

⑨ 參見王宏志：《1814年「阿耀事件」：近代中英交往中的通事》，《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59期（2014年7月），頁203-31；吳義雄：《國際戰爭、商業秩序與「通夷事件」——通事阿耀案的透視》，《史學月刊》，2018年第3期，頁66-78。

⑩ 沈艾娣（Henrietta Harrison）：《中文版序》，載沈艾娣著，郭偉全譯：《傳教士的詛咒：一個華北村莊的全球史（1640-2000）》（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21），頁xiii-xiv。

⑪ 參見沈艾娣著，趙妍杰譯：《夢醒子：一位華北鄉居者的人生（1857-1942）》（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

⑫ 沈艾娣：《傳教士的詛咒》，頁6。

⑬ 比如，我們所熟知的條約制度的建立，並不是西方列強迫使清政府簽訂《南京條約》、《天津條約》就能實現的，而是隨着時勢的變遷，在中西、官商各方勢力的互動中逐步建立和完善的。筆者的博士論文《上海英商與條約體系下的中西貿易制度——以上海外國總商會為中心》（中山大學，2023）也專門討論上海的英國商人群體介入和影響中西貿易制度建立和調整的過程。

⑭ 參見Nicholas Mcgee, "Putting Words in the Emperor's Mouth: A Genealogy of Colonial Potential in the Study of Qing Chinese Diaspora",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30, no. 4 (2019): 591-619。